

历史 史 遗 痕



历史遗痕

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

策 划 高智瑜

编 者 林 华 余三乐 钟志勇 高智瑜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6 号

历史遗迹

利玛窦及明清西方传教士墓地

策划 高智瑜

编者 林 华 余三乐

钟志勇 高智瑜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编 100872)

印刷者：北京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6 开

字 数：240 000

印 张：10 插页 9

版 次：199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 300

书 号：ISBN7-300-01941-2/K·194

定 价：14.80 元

138038

历史 遗痕



利玛窦像



南怀仁像



汤若望像



山字楼·圣母会修道院



山字楼教堂



山字楼东侧



口字楼—文声学院



文声学院



原神父宿舍



原墓地石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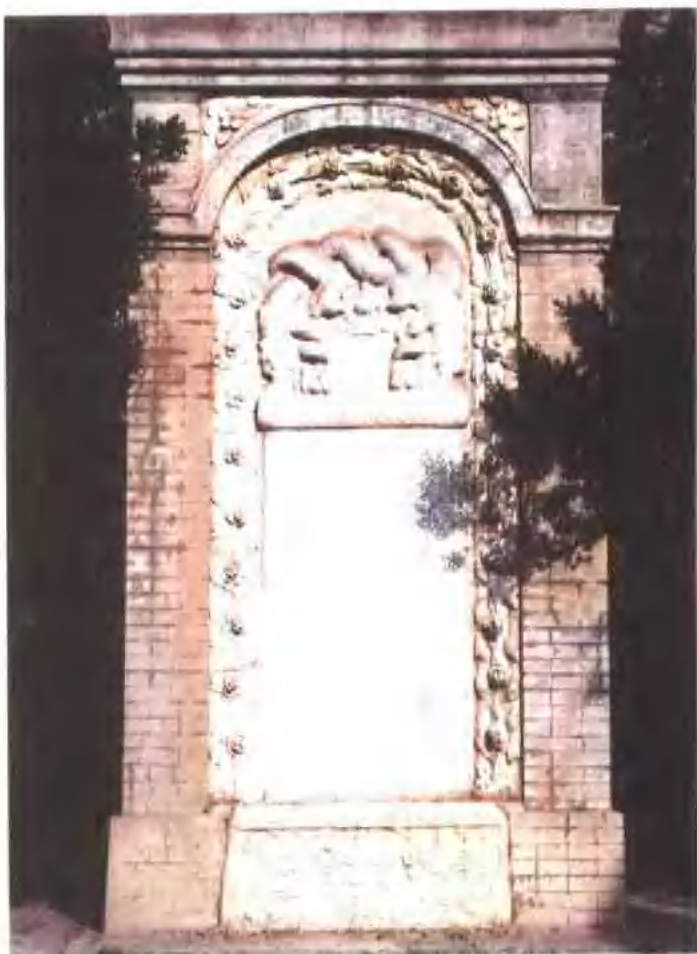
石门前残碑



利玛窦、汤若望、
南怀仁墓地及墓穴



历史 遗痕



利玛窦墓碑



汤若望墓碑



南怀仁墓碑



明清传教士
墓地



墓地一角



墓地一角



碑首



碑首



碑座



碑座

葡萄牙总理
拜谒碑林



历史遗痕



法、奥、捷、荷、瑞典
大使参观墓地



德、智、阿根廷、
委内瑞拉、厄瓜多尔
大使参观墓地



意大利天民党主席、
意大使拜谒墓地

目 录

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1
几度沧桑话“栅栏”.....	7
栅栏墓地碑文录.....	21
栅栏墓地碑文资料录.....	121
来华西方传教士研究文献检索.....	151
后记.....	157

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北京西城西北隅一座幽静校园内，浓荫蔽日。在苍松翠柏和黄杨柔枝交相掩映下，银灰色低矮花墙护围着一大一小两块经过另行修整的墓园比肩立于校园中央。小园内，倒品字形端立着三块墓碑，著名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墓碑居中，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的墓碑仁立于左右两侧。大园中重新树起的墓碑林林总总，厚重深沉。栅栏墓地早期南大门（俗称石门）也已搬迁至小园正前方，从而形成校园内独立的墓地格局。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滕公栅栏墓地。

自1610年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第一个入葬于明万历皇帝钦赐给他的这块墓地起，相继有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著名传教士、科学家、画家随之而静卧于这方土地，墓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栅栏墓地已先后埋葬了约数百位西方传教士，成为明清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地方。

栅栏墓地距今已有383年的历史。三个多世纪，在西欧进入资本主义之后接踵诞生的栅栏墓地，经历了几多风雨。这一时期，西方各殖民主义国家都曾利用天主教作为对外掠夺的工具。在中国，天主教为侵略目的服务的作用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一百年间，耶稣会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曾给中国造成过许多重大灾难。这是人们所不应忘却的。在此以前，受遣来华的传教士，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确实负有为殖民主义掠夺、扩张做意识形态方面准备的责任。但是，以讲习西洋科学为手段、以宣传天主教为目的的一批传教士们，却又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这同样是人们不该忘怀的。

生存于世界这个泱泱系统中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在各自所处的客观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经过世代代的实践、求索，不懈的努力，创造出有别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以及由原始图腾崇拜幻化而来的各具特色的宗教。宗教从来都是世界上一切民族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无法拒绝的一种理性的扭曲反映。当它一旦与统治阶级相结合，就会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给人类社会诸多方面以深刻影响：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观念的；等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看作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文化思想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世界上逐渐形成迄今为止人们所认同的四个文化圈，即儒教文化圈、佛教印度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四个文化圈相互渗透，联系日趋紧密。例如，在儒教文化圈地域内，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文化现象皆有所见，构成

以儒教为主体，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其间，彼此虽有矛盾冲突，但并存局面从未消弥。其余三个文化圈的状况也大抵相类似。应该说，这种渗透与联系，是与世界范围内经济联系的增长和国际交往的加强相一致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交融，文化交融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文化交融与社会进步是共生共存的。

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时，外来文化包括宗教的传入，不是与这个国家的先进文化相融合，就是被打上先进文化的深深烙印。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种领先地位又不是一层不变的。人类社会就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先进更迭中向前迈进，从而带动着人类文明日益走向成熟。这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所昭示的历程，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交流，它向人们揭示了世界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因为如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地区要求得到振兴、发展，就一天也离不开对他民族、他国家或地区敞开自己的大门。开门，就意味着交流。而在这种广义的文化交流中，宗教应该说是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的。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对世界的接纳并走向世界，其源甚长，而经济与宗教，又常常是这种接纳和走向的重要手段。在中国，规模宏大者，一般认为有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和西方文化输入两次。

两千多年前，秦统一中国后，徐福方士率领三千童男童女的浩荡队伍，抱着为始皇帝寻求长生术的企盼，东渡大海，一去杳无音讯，不明所终，无法知晓其在始初的华夏文化输出事业中有哪些确切贡献，但这毕竟是最早大规模迈出国门的一次尝试。两汉时期，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其遣使的足迹就曾远达中亚、罗马帝国及波斯湾一带，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做出了贡献，促进了中国与中亚经济文化的交流。两汉之际，佛教也在这种交流中，经由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其后，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侣纷至汉地，以洛阳为中心，进行佛教的宣传及经典翻译活动。佛教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到唐代达于最盛。东晋僧人法显，唐代高僧玄奘及净义，就是古代中国西向研习佛教最有影响的代表。所得梵本佛经及个人著述，都同时是研究中亚、南亚诸国历史文化、风俗民情的宝贵资料。在长期颂佛传经过程中，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经过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已在很大程度上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佛教的诸多宗派在唐代形成，中国也在事实上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几乎与唐代佛教鼎盛的同时，先后经“丝路”（陆路）与“瓷路”（海路）传入的伊斯兰教，折射出中西交通的大开与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发展，成为影响最大的外来宗教。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随着古代中国先进农业、手工业技术的西传，中国文化包括儒教文化也源源传向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并日渐产生实际的影响。可以说，汉唐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儒教文化的输出，表明宗教文化在推动中外的相互了解，以及影响古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起过不小的作用。这就是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交流。

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大规模中外文化交流，开始于封建大一统中国走向衰落的艰难时期。站在介绍西方文化前列的，无疑是一批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明以前，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两起两落。早在唐贞观初年，基督教的一个分支景教就曾由叙利亚经波斯传入中国，并在长安建寺，向全国各地传播，信仰者甚众。后在武宗会昌灭佛中同时被禁，从此在中国基本绝迹。至元代，由于最高统治者对宗教取兼容政策，基督教也同道教、佛教一样得到较大发展。在中国的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就是 13

世纪末由罗马教皇派来大都（今北京）的。当年大都城内曾设教堂两所，受洗礼者数千人。元顺帝因受传教士的馈赠，曾通过他们致函教皇。从此，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就大规模开展起来，元末时信徒已达3万。这对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元灭，基督教在中国也随之一度湮灭。

随着1498年东方新航线的发现，大批欧洲殖民者、商人等又相继东来从事侵略或贸易活动。最先涉足中国的葡萄牙人于1535年开始占取澳门，天主教耶稣会士也纷纷被委派，由此进入中国内地，甚至远达北京跻身于最高统治集团。其主要代表当首推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

利玛窦，意大利人。1582年来华，先抵澳门，后在肇庆、苏州、南京、南昌等地活动，并随时准备进京。1598年曾在一王姓尚书帮助下到过北京，不久即因故离去。1601年1月经天津再次入京，直到1610年4月去世。在华28年。邓玉函，瑞士人，1620年抵澳门，后奉命前往浙江嘉定学习中国文字，曾去杭州避难。经徐光启推荐到北京朝廷负责制定历法。1630年去世，在华9年。汤若望，德意志人，晚利氏40年来华，曾在京学中国语言及习俗，不久去陕西。1630年再入京，接替邓玉函完成历书编纂事业。明亡归清。康熙初年被劾入狱，获释后继续从事传教及天文研究著述活动。1666年殁于北京，在华44年。南怀仁，比利时人，晚汤37年来华，先在陕西协助汤从事传教活动，次年至京，后与汤同时入狱，获释后幽居北京，康熙七年被起用，1688年去世，在华29年。四人均入葬栅栏墓地。

在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涌动中，由罗马教廷任命为东方大教区的副主教范礼安，首先提出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方式，以求得发展，并要求传教士们潜心学习中国语言习俗。后于他来到澳门的罗明坚、利玛窦也认为，最有效的布道方式莫过于精通中国语言以及风俗、观念。这些认识，在事实上推动了通过传教活动促进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融。利玛窦则堪称开此先河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第一人。有人称赞他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最高范例”，贡献“是永垂不朽的”（李约瑟语）。

毫无疑问，与一切传教士的目的一样，利玛窦来华，为的是在潜移默化中争取中国朝野上下、官吏平民有更多的人接受并信仰天主教。在达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上，他则高出其先行者和后来人。他深知，要在一个封闭的东方封建大帝国宣传与其传统文化完全相左的宗教教义，不深入于这个大帝国的社会内部，不了解、不谙熟它的礼仪风俗民情，是绝然不会有收获的。正因此，他对经过传教拥有多少信徒并不十分关心，他更重视的是通过西学和科学技术的介绍，加强对中国上层社会的影响，以引起中国人对天主教的关注。28年的在华生涯，他正是将尊重中国文化、介绍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宣传教义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第一种结合，即尊重中国文化与宣传天主教义的结合，利玛窦以及不少传教士都认为，只有熟悉并尊重中国文化，才能得到中国百姓的尊敬，从而在中国站稳脚跟；而要真正获得在中国稳固的传教权，争取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正因此，他们就十分重视与身居高位的中国士大夫和社会名流的广泛接触，以期由此打开通向朝廷的路。

基于上述认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从学习中国语言开始了在华的传教生活。不少人一到澳门，就专心致志于中国语言的学习。利玛窦更是将精通中国经史，熟悉中国文化甚至讲习北京官话作为自己的目标。当然，能够推动传教士们潜心习汉的

重要原因，还在于灿烂的中华文明确实深深地吸引着这群对古老中国知之甚少的西方人。于是，这些高鼻蓝眼的异乡客，以仰慕中国文化和政治而诚心朝拜为由来到中国，逐渐被中华文化所濡染，他们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口操流利官话或方言，过着中国式生活，并熟练运用古典书籍，引经据典进行传教。这些努力，很快在感观上大大缩小了西洋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为迎合中国人含蓄、内向，讲究秩序的心态，他们特意变欧洲式街头大众传教方式为有问有应，促膝谈心（与官吏的交往尤其如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对于神学宣传，他们也尽量在翻译上选用较易为中国人所接受并有亲切感的用语，例如将“上帝”称作“天主”，即“天上的主人”，这就得到了“敬天法祖”的中国人的认同。对于主要表现为中国人尊孔祭祖活动的“法祖”，教会应持何种态度呢，熟悉中国文化的利玛窦认为，这不是一种宗教迷信，而是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的民俗，天主教不应加以禁止，而应允许并尊重中国教徒参与这种传统活动的权利。尽管这一处置在以后引起了一场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但历史证明利玛窦的主张是正确的。不知当年利氏是否懂得“入乡随俗”这句为中国人所信奉的话，但他在行动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是令人钦佩的。

值得一提的是，早期来华的许多传教士，都十分重视研究儒家思想，熟悉中国伦理、制度，他们常以汉文著述的方式，向中国人解释和宣传天主教义，历史上统称此类书籍为“汉译西学书”。罗明坚所著《天主圣教实录》，为此类书之最早者，最著名的当数利玛窦的《天主实义》。曾与利玛窦“三度相会”的李贽就赞扬他是“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行此间之礼仪”，“中极玲珑，外极朴实”的“极极致人也”。足见其中学造诣之深。

在第二种结合即促进介绍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宣传天主教义相结合的过程中，利玛窦等传教士利用广泛接触朝野著名人士的机会，巧妙地利用西方科学知识博取他们的信任，从而扣开了进入统治集团内部的大门。传教士们与中国士大夫频繁交往，万历年间的进士不少人就与利氏关系密切，其中尤以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叶向高等人为甚。他们常聚游一处，或以儒家经典相切磋，或以西方天文、数学及地理知识等相沟通，言道言理，上穷九天，旁该万事，所学皆有长进。与利氏过从甚密的徐光启，1605年就受洗礼入教，曾为利之著作撰《山海与地图经解》，解释天地为圆体之说。自1606年秋开始，由利口传，徐光启笔受，以半年时间，三易其稿，译成《几何原本》前六卷，付刻前，又撰《刻几何原本序》，称利先生从少年时，论道之暇，留意艺学，所译六卷，皆“由显入微，从疑得信”，“真可谓万象之形图，百家之学海”。在另一篇《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认为，读此书，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更得出了“几何之学，缜密甚矣”，当世“习者盖寡”，“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的结论，其思维的睿智和预测的准确，由此可见一斑。另一著名学者李之藻也常求教于利玛窦，在撰写《浑盖通宪图论》过程中，每每请其审定。其后，经利口授“测圆”、“割圆”、“穷研天体”、“表里算术，推演几何”等内容，由李之藻演撰成“环容较义”。而利玛窦也在与众多士大夫的接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其去世前两年，就曾撰写了问答式著作《畸人十篇》，以儒家学说讲述天主教理，问答所涉及的著名士大夫就有徐光启、李载、吴达可、龚三益等人。李之藻、周炳谟等为其作序。此一著述，实际上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通过传教士，使中国开始了解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通过传教士，又使西方进一步认识了古老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这种直接而又便捷的双向学习，对推动第二次中西文

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耶稣会士徐日升当年在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传教士对俄国来说，他们是当汉学几乎还不存在的时候最早的东方专家和汉学家；对中国来说，他们是当中国人对西方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最初的西方专家。借用这个评价来审视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传教士，也许是颇为贴切的。

传教士们与中国士大夫阶层深入交往的直接成果，就是一步步接近了中国最高统治者。他们知道，士大夫们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学识远比对宗教更感兴趣，因而极力以此赢得朝廷的信任和支持，并获得在京城传教的权利，不少人甚至担任了朝廷命官。当年在两广总督帮助下进入肇庆的利玛窦，1598年曾经由位在尚书的王姓官员协助到过北京。1601年1月再次正式入京后，即向万历皇帝进献方物，那些新奇的自鸣钟和其他器物，颇得皇帝欢心，遂被邀留于宫内。

利玛窦了解到皇室对制定历法有浓厚兴趣，即专请耶稣会本部派来懂得天文知识的人员，为皇室制定新历法。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邓玉函、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南怀仁等就曾先后参加过明清两朝制定历法的工作。与邓玉函共同参与此事的中国官员，有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崇祯二年，改宣武门内首善书院为历局，成为专门从事修历工作的机构。邓去世后，汤奉召入京，继续完成此项事业，同任此事的有罗雅谷、南怀仁。至1634年，经5次编修的137卷《崇祯历书》终于完成。明亡后，汤继续为清修历，1645年任清钦天监监正，1646年因编《大清时宪历》有功，升任太常侍卿。在清代，南怀仁曾因制造天文器材有功，被授予太常侍卿，康熙十七年又因修历有功而被授予通政使官职。汤、南二人还分别奉命为明清两朝制造过大炮，深得统治者的赏识。在紫禁城内供职的一些传教士，与中国官员一道测定过日蚀，测量北京所处纬度，为进一步以科学态度认识自然现象做出了努力。

除制定历法，传教士们还多有著述。这些汉译西学书多为宣讲教义之作，其中也不乏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就集中传授了西方农业生产知识，在京共发6册发行。傅汎际将亚里士多德的《天地论》译成汉文，另有一本《名理探》，则是将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知识直接翻译而成的。

在为朝廷服务期间，这些传教士们并未忘记自己身负的传教职责。当他们因宣传西方科学知识和奉献先进器物而博得朝廷上下的赞赏后，就开始了在紫禁城内的传教活动。仅汤若望一人，就为明朝紫禁城内的后妃、高官和皇室随从等约200人授了洗礼。供职于清廷后，汤更被顺治帝尊为“玛法”，信教者日众。1650年，汤在北京建立天主堂南堂，顺治钦赐“钦崇天道”匾额以示恩宠。次年，更授予“通义大夫”称号。仅1650年至1664年的15年间，信教人数就达到10万人。可以说，具有浓郁西方特色的宗教，在东方部分地发挥了作用。西方传教士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成果，尽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仅限于宫闱之内和士大夫群中，并未走出红墙，走向社会，但是，它的影响及缓慢产生的裂变，却超过了他们在传教方面的记录。这也许是罗马教廷所始料不及的。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得到了历史的启示。由明末开始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大潮，如果按照已经开辟的道路顺利地走下去，可以预料，东西方之间在科学领域内的差距将会逐步缩小。这是因为，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并不是只有四大发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天文、数学、力学、历算等方面，我们也并不都落人后。东汉郑玄就早于英国学者胡克1500年发现了弹性定律；祖冲之计算圆周率的准确，亦为世人所称道。这说明，文化积淀